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王元鹿 主编
俞水生 著



汉字中的 人文之美

全方位展示汉字的美

汉字中的 人文之美

王元鹿
俞水生
主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字中的人文之美 / 俞水生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12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 王元鹿主编)

ISBN 978-7-5496-2265-8

I. ①汉… II. ①俞… III. ①汉字—研究 IV.
①H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8675 号

丛书策划: 张 衍

丛书主编: 王元鹿

出 版 人: 桂国强

汉字中的人文之美

看懂中国字 读懂中国心

作 者 / 俞水生

责任编辑 / 乔 聿

封面装帧 / 王 翔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180 千

印 张 / 14.5

ISBN 978-7-5496-2265-8

定 价 / 47.00 元

序

王元鹿

有一件美好的东西，日日与您为伴，日日为您服务，您却常常忽视了它的美——内在的美与外在的美，这就是汉字。

汉字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遗产之一。如果说到汉字的特点与特色，一言以蔽之，就是美。汉字的“美”包含了使汉字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客观环境的美——有物质的美、精神的美、逻辑的美，还有大自然的美。汉字的“美”也反映在汉字自身的构成与形态上。造字方法的精巧，文字姿态的曼妙，都令人赞叹不已。

汉字的“美”有其历史过程。如以甲骨文的产生为起点，汉字至少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何况甲骨文其实还不能算是汉字的最早形态。然而，即便在甲骨文与早期金文中，我们已经可以领略其古朴与端庄，还可以理解通过其字形背后的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生活现象，乃至我们祖先的造字的智慧——这一切，都是美不胜收的。

今天我们使用的现代汉字，已经是几经变化的形体，多少已失去了它们的早期风貌，也不易推断出祖先造字的依据。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我们逐步深入了解了古代汉字的来龙去脉，并进而通过古代文字的研究去搜寻我们祖先的生活状况及他们的精神风貌。可以说，从汉字看历史，又从历史来追溯汉字的渊源，既是一个科学研究的过程，又是一个欣赏文字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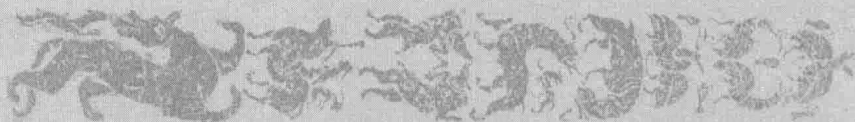


的过程。

必须说明的是，这套书是在参考古今许多文字学及相关学科专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出的。限于丛书的体例，行文中引用或述及文字学专家或其他领域专家的观点与成果，一般不专门写出或注出他们的名字及这些著作的名称。在此，向这些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

美是需要去发现的。由于我们见惯并用惯了汉字，才使我们习以为常地不去注意其内部蕴藏着的美。这套丛书，就是鉴于此种情形策划设计的。从文字与文字相关的角度——语言、历史、文化、考古、文学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地挖掘并向读者展示汉字的美，是本丛书作者的美好愿望。如果读者随着我们的笔，在弄清一个个古文字的同时，进一步了解它们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们的祖先的思维特点与心路历程，这将是何等快意的事！

2012年7月写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目录

序

王元鹿

壹

社会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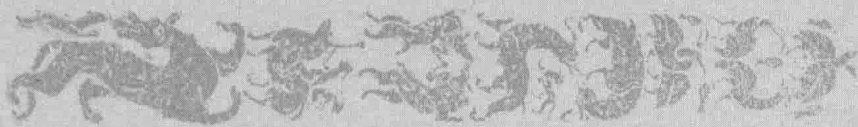
贰

宗教信仰

叁

农耕文明

100	95	90	85	80	72	66	61	56	51	46	39	34	29	24	19	13	8	2
百谷之长——『禾』	『田』字源起——井田制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家』，永远的牵挂	中『国』的来历	众『神』的背后	人『鬼』情未了	从『宗』庙到四合院	中国人的『祖』先崇拜	『和』为贵	『天』人之间	说『圣』人	此谿非波『后』	『君』与君子风度	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古代『商』人面面观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农』——天下之大本也	『士』与士文化



肆

文化载体

112 106
美丽的『丝』绸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120
『笔』的传说

125
『墨』香飘逸

131
『纸』的记号

136
『砚』趣

141
说『文』解字

伍

伦理观念

148
『仁』者何以无敌

153
万事莫贵『义』

159
不学『礼』，无以立

164
『智』者为何不惑

169
人以『信』为本

175
何谓『忠』

180
『恕』与恕道

185
『节』与符节、节操

191
见义不为，无『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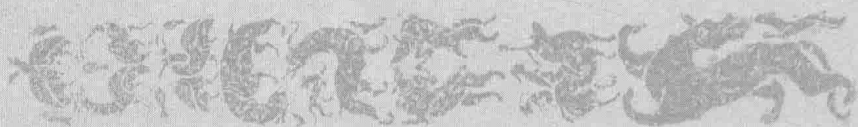
197
『让』者，礼之主也

203
知『耻』而后勇

208
『敬』业与乐群

213
记住一个『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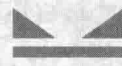
218
『悌』——兄弟之道，手足之情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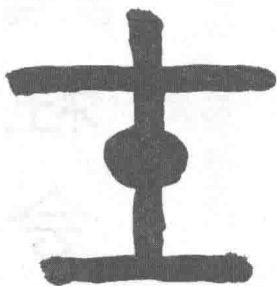
社会众生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齊太后 後漢書 卷之



【“士”与士文化】



作为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早在春秋时期就有较为明确的社会分工意识，开始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其次序历代有所不同。《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春秋谷梁传》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亦有“农士工商”的排列。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曾说：“士农工商谓之四民，其说始于管子。”认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最先定下“士农工商”的次序，后一直沿用至今。

在古代“四民”当中，商的地位最低，屈尊末位，这与封建统治者向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相应。那么，士的地位又为何最高，能排列首位呢？这主要与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关。

关于“士”字的造字依据，有专家有这样的看法：甲骨文中的“士”

作“士”；金文中的“士”字，和“王”一样，是斧钺的象形。不过，“王”是一种具有权力象征意义的大型战斧（黄金大钺），写作；而“士”则是一般的斧状兵器，写作，像是一把倒置的、有手柄的宽刃战斧。其造字本义是指手持战斧作战的武夫。金文“士”亦简写作，有意突出斧柄而淡化了斧刃。篆文则承续简略笔画的金文字形，写作，已接近后来楷书的写法。

在远古冷兵器时代，将士所使用的武器就代表了他们在军队中所处的地位。古代的斧钺为一种礼器，象征王者的权威，因此使用黄金斧钺的将帅叫“王”，而用普通战斧作战的称为“士”。后来，“士”成了古代四民之一，指农工商以外那些学道艺、习武勇的人，或称“士民”，以区别于“庶民”。

“士”，当它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是中国古代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特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先秦时期“士”是贵族的最低等级，仅次于大夫。他们作为封建社会中最基础的贵族，同时也是最高级的百姓，其地位又在庶民之上。古代欧洲有骑士，日本有武士，而中国则有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族阶级。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条件掌握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秦汉以前，“士”可谓是社会中坚力量，当时凡能通“六艺”者皆可曰士。所谓“六艺”，一般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一说还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故《说文解字》曰“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训“士”为事，强调“士”是以一身而兼备文武才艺之意。

所谓“推十合一为士”，即孔子认为，有演绎和归纳能力的人才可称为士。《左传·昭公七年》孔颖达疏：“士者事也，言能理庶事也。”意



思是，“士”具有管理事务的能力。刘向《说苑·修文》则曰：“安故重迁，谓之众庶；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刘向认为，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人是普通百姓；能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通达历史兴替的人，才称得上“士”。

春秋时代，士阶层开始出现分化。由于各国征战不休，有些卿大夫为巩固或扩张领地，想方设法招徕士众，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一些士为谋生，有经营工商业；或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也有人开始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士。他们思想活跃，游学各国，为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战国纷争，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各诸侯国战争兼并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这种“游士”穿梭于各国之间，充当说客。其中，如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便是突出代表。他们知识丰富，思维敏捷，既能言善辩，又会揣摩当权者的心理好恶，一旦自己的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时，便会另择他主。与此相应，各国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只要有一“技”之长者，就会受到这些贵族的豢养。战国后期著名的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甚至不惜财力养了数千士众。当时甚至形成这样的舆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可以说，这是士人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秦汉时期，士的内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由于统治者对“武”的限制，士便逐渐由文武合一转为偏重“文”的方面，一般多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汉代，士人特重名望及学识才能，一旦成为名士，功名利禄便会随之而来，故许多士人广结朋党，相互吹嘘，以沽名钓誉。东汉后期，在士人中间又开始流行清议品题人物的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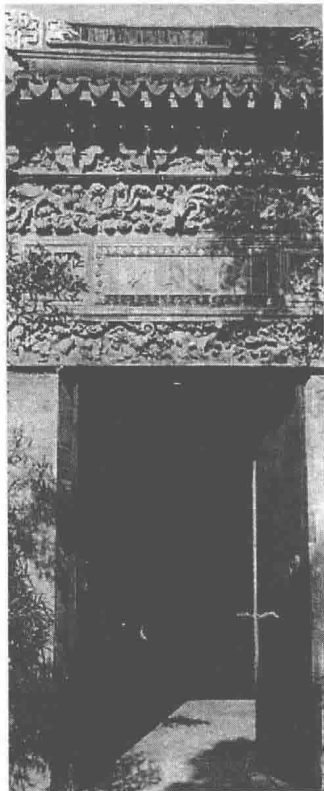
孟尝君画像

引自潘勤孟改编，叶毓中绘画《孟尝君——东周列国故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



魏晋之际，九品中正制确立。凡由中正品评者，皆据其德行才能及家族阀阅而给予不同品第，然后授予各种官职。未经中正品评者，不得仕为品官。于是，士人又有了某种特定阶层的含义。凡九品以上官吏及得到中正品第者，皆为士，否则即为庶。士人中，又出现凭借先辈官爵得以入仕并累世为官的家族，称为士族。士族在东晋达到极盛，造成朝廷一些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亦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导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的现象。士族门阀制度盛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魏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直到隋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出现，士族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从古到今，“士”的一大社会特征就是包括当官或不当官。古代士、仕二字本可通用。仕在金文写作, 篆文作, 从人，从士，本义就是做官。古人一旦当官就叫“入仕”或“步入仕途”；而那些“学而不仕者”，也皆属士的范畴。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先秦诸子百家及后来各种学术流派的代表，都可进入“士”的行列。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待遇，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似乎从来就



顾炎武故居

引自叶庆瑞《顾炎武故居随想》，《扬子江诗刊》2002年第6期。

不济。当年老子西隐、孔子流离、孙子刎足、商鞅车裂、韩非囚秦、司马迁入狱，不一而足。士阶层最不幸的时期，大概要算是元代了。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读书人列为第九等，仅居于末等的乞丐之上。有人认为当代“臭老九”一词应源于此说。

毋庸讳言，古代士林也有不少败类，但传统的士风是重品行、讲操守的。尽管士人在经济上总是处于附庸地位，人格上却极为自尊。他们重名节而轻名利并形成传统。古有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孔子则过盗泉渴而不饮。后来儒家又以修齐治平为要务，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士”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天下有道还是无道，士人们都在自觉践行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从东汉末党锢领袖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明代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明末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晚清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代代相

承，中华文明才得以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古老的封建时代，但它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在政治清明之时，它会占据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而在社会动乱之时，则往往又被边缘化。但它始终没有泯灭，一旦条件具备，又会顽强地显示出来，成为社会文明发展的推动力。这种士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已传承了数千年，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同美酒，愈陈愈浓。



【“农”——天下之大本也】



中国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还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代，孕育于原始采集狩猎经济的母体之中。在炎帝之前的蛮荒时期，先民们不知耕种，只知采摘各种草木果实以果腹。在古代典籍中，有“神农氏”炎帝发明耕播工具——耒耜的记载。《易经·系辞》中有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之说；《礼记·含文嘉》也说，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学上找到一些证据。如现今发现的大量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遗址，遍布全国各地。从岭南到漠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尤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最为密集。

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农”字，有等形体，虽然写法各异，但都像手持工具耕作于山林草地间之形。在古代社会，农业关系着人们的生活生存。因此在甲骨文中，有不少关于人们祭祀“农”的卜辞。如

“己酉卜即贞告于母辛夷农十月”（《殷虚书契前编》五·四八·一），“甲寅卜王夷农示帝五月”（《殷虚文字乙编》二八二），“丙午卜即贞翌丁未丁农岁其又伐”（《殷契佚存》九二四）。“农”从林，从辰，是一会意字。造字本义是垦荒耕种。古代森林遍布，如要进行农耕，必先伐木开荒，故从“林”；又古代以蜃蛤的贝壳为农具进行耕耨，故从“辰”，“辰”在甲骨文中正是蚌壳的象形。

金文“农”亦有多种写法，如《田农鼎》中作“𡿨”，《泂其钟》中作“𡿨”，《农簠》中作“𡿨”，等等。与甲骨文不同的是，金文“农”字多了“田”的部件，表示荒山野草中开垦出的田地。而下面𡿨（辱），有荷锄劳作之意。金文中还有比较简略的写法，减少的主要是表示草木森林的部件𡿨、𡿨，如《史农解》中的“农”作𡿨，《田农簠》中作“𡿨”，两字都从田，从辰，其意更加明显，即在田里耕耨。篆文“农”作𡿨，将金文中的𡿨(林)写成𡿨(双手)，有强调用双手进行耕耨的意思。又小篆认为从辰，同晨，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意。对此，《说文解字》的解释言简意明：“农，耕也”。《汉书·食货志》则曰：“辟土植谷曰农”。

在中国古代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一直是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性格特征。《汉书·文帝纪》曰：“农，天下之大本也。”晁错《论贵粟疏》亦云：“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正因为如此，重农抑商就成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从商鞅变法的奖励耕战，到汉文帝的重农措施，直到清代初期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体现。

在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十多篇专门描述农业生产的诗篇，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农业生产和生活的状况。《邶风·



七月》就是一首完整的农事诗。诗中依次叙述了每月所从事的农务、女工及采集、狩猎等事项。其他诸如《周颂·臣工》、《大雅·生民》、《大雅·绵》、《小雅·甫田》等等也都有反映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

战国至西汉时，曾产生一个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农家。《汉书·艺文志》云：“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班固把它列为“九流”之一，并著录其代表人物与著作，如《神农》二十篇、《汜胜之》十八篇等，共九家百十四篇，但多已失传。《孟子》中载有许行其人，亦属农家学派。针对当时不少学派鄙视农业生产，许行提出贤者应与民同耕而食，饗飧而治，反映了战国时期农民的一种朴素的社会政治理想。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也有过专门总结。《管子》中《地员》，《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均为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后世《齐民要术》、《农书》、《农政全书》等著作，为先秦农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对当时及后来的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农耕图 汉画像砖

引自左民安《细说汉字》，九州出版社，2006年。